

第一章 绪 论

民俗学是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as)于1864年用撒克逊(Soxon)语的“folk”和“lore”两个词合成的。原来这个名词的含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作为学科名称可以直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到了1987年10月，英国伦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民俗学的学术机构时，学者们便将这个新名称命名为“民俗学会”，从此这个名称获得了国际的承认。^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博尔为代表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与较先进民族无文化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②。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认为：“民俗学是研究那些或者是以口头的形式，或者是以风俗的形式，或者是以实践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形式。”^③从总体上看，民间文化传统几乎名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它以鲜明的经验和功能的实在性，始终处于低层次的原生文化状态。但它又执著地发展和完善着，成为在口传心授和行为的实体传播过程中自臻成熟的文化体系。换句话说，民俗学研究是民众的、最低层的、原生态的文化（小文化圈）。因此，民俗体育文化指的是民众（民间）的、原生态的体育文化。

尽管目前有关民俗的定义学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纵观不同的有关民俗的定义，便会发现其本身有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一是民俗的创造者；二是民俗的传承性；三是民俗的归属感。因此，较为科学的民俗的定义可为“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统文化现象”^④，或简言为：民俗是一种民众传承的文化传统。乌丙安先生把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作了以下概括：“一、经济的民俗：它是以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

① 杨群：《民族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博尔尼，程德祺：《民俗学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③ W. W. Norton&Company：《Brunvand1 The Study of Aerician Folklore》，1986年版。

④ 张紫晨：《中外民俗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二、社会的民俗：它是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礼仪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信仰的民俗：它是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的诸事象为主要内容的；四、游艺的民俗：它是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其中也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①从我国民众传承的文化传统来看，其中民俗体育的内容非常多，诸如元宵节、龙抬头节的舞龙、舞狮、划旱船、踩高跷，三月三放风筝，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民俗事象在我国民间已有上千年历史。从宗教信仰民俗的角度说，舞龙、赛龙舟可以看做对龙的图腾崇拜；从宗教角度看，傩舞是敬畏鬼神的宗教活动；古代游艺民俗中的民俗体育活动就更多了，如打陀螺、俄多、击石球、打漂漂、扔石头、打鸡毛球、舞花棍、跳竹竿、跳皮筋、放风筝、拍纸片、老鹰抓小鸡、甩飞盘、蹦蹦球等，不胜枚举。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俗体育学的研究范围也较广泛，凡是人类社会中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口头再到行为，所有形成习俗惯例世代传承的体育事象，都在研究之列。关于民俗的本质，陈勤建先生做了比较深刻的概括，他认为：“从人类文化意识结构看，民俗是它基础层中未经分化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团”，“民俗处于文化意识阶梯的最低层……是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支柱”，“是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体”，“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②

由此可见，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民俗体育是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又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民俗体育也是民间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的本体属性在于民俗的本体属性，以钟敬文先生和乌丙安先生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民俗的本体属性在于其“集体性、类型性、继承性和扩布性（传统性）”。因此，首先，民俗体育是集体性的，它存在于一定的民众群体之中，民众既是民俗体育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又是民俗体育的载体；其次，民俗体育是

①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陈勤建：《中国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一种模式化的体育活动，民俗体育的结构、程式在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并被他们所共同遵循，如龙舟竞渡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民俗体育事件；再次，民俗体育是一种传统性的体育文化，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种社会文化，在空间上也可以传播和扩布；最后，民俗体育是生活化的，它是一种生活文化，它依托于各地域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等等）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因此民俗体育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韩两国在古代都属于农业国家，因此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民俗活动，同时两国作为东亚邻邦，自古交往频繁，其中韩国的传统文化、农耕技术和农耕文化广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影响，因此两国民俗活动在形式、内容和内涵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民俗文化作为民众广泛认可和参与度最高的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资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劳动和精神信仰等方面息息相关，民俗文化在传承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连贯性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韩两国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很多，虽然在名称、活动形式上相同、相近或相似，但是这些民俗体育的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民俗体育活动的庆典仪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就是两国民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两国传统文化、地域环境、自然环境和民众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两国民众对待民俗文化态度等方面的体现。许多民俗体育作为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遗存，正如泰勒所说：“在那些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明的实际进程的证据中，有一广泛的事实阶梯，我认为可用‘遗留’这个术语来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高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① 泰勒的研究逻辑是：由于古代社会的文化遗留在现实的文化当中，所以对遗留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文化遗留可以被视为“文明进步全过程的路标”。中国的传统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的传统拔河民俗，分别是两国重要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体育活动，也是两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明进步全过程的路标”。这两种民俗体育文化，历史久远、内涵丰富，有一套规范而繁琐的民俗庆典仪式的程式，两者的庆典

①（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仪式行为、庆典仪式过程都表现出相应的民俗思想特征和人文地域精神。

民俗文化遗产，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智慧，是劳动人民在生活、生产过程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而作为民俗庆典活动，是民俗文化得以传承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下层劳动人民社会交往、娱乐休闲和精神寄托的方式，因此在庆典过程中会融入大量的祭祀仪式和体育竞技元素。中国的传统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的传统拔河民俗的庆典仪式活动分别展示了两国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内涵，体现了两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层面上的差异性。对两国的这两项民俗文化活动进行社会学、文化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有利于两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有利于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和发展。

“文化学”是关于文化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全人类和各民族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类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遗产、现象和事件。其中民俗庆典仪式是民俗文化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庆典仪式深刻反映了民俗文化体系的文化内涵、民俗思想和民众的精神信仰等民俗文化的结构。中国的传统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的传统拔河民俗都会举行繁琐的民俗庆典仪式，在民俗庆典过程中都会举行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仪式行为，两者的庆典仪式行为就是研究两国民俗文化的桥梁，通过民俗庆典仪式的研究就能在两国民俗体育文化中，发现很多相同或相似的仪式行为，以及在仪式过程和仪式行为中所展示出来的有关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同和差异。

第一节 研究的必要性和目标

一、研究的必要性

人类学家用“仪式”(Ritual)这一术语来指与仪式的、非功利目的的地位有关的活动，包括诸如节日、庆典、诞生礼、入会仪式、婚礼、葬礼、游戏等事件，而不是仅仅限于宗教仪式。甚至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仪式还涉及所有人类活动的表意方面。由此，有学者定义仪式是一种由文化来构建的象征性交流。它由模式化的、有秩序的一连串词语和行为构成，经常在多媒体中得以表

达，其内容和安排表现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正式化（习俗化）、模式（严肃性）、集中（混合）和循环往复（重复）。仪式在建构特征上是表演性的（N.D.Munn, 1973）。而且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莫尼卡·威尔逊，1954）。

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民俗庆典分别展示了两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事象，体现了两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其庆典仪式就是一种仪式和仪式行为过程，并体现出仪式的内涵和外延，能够表达两国在乡土社会和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民俗风情和民众的精神信仰。虽然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在形式上属于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体育，但是它们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都是仪式化的民俗体育，是民俗庆典仪式的载体，在民俗庆典活动上都会举行形式繁多的仪式行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作为桥梁，对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民俗的民俗庆典过程中的仪式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及影响因素和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能够丰富中国传统龙舟竞渡民俗活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传统龙舟竞渡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项民俗体育文化活动，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的影响，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农业民俗节日和民俗事象，农业民俗是伴随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农业生产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在农业民俗活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民众对季节的更替、生活方式的展开以及农业生产劳动规律性的把握，对自然、生态、人文现象的理解及掌握，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贯穿民众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成为各种知识、方式、手段和思想延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得到边缘文化的侵入并与其融合，使得文化的空间和时间都得到扩张，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特征也会逐步丰富。因此传统龙舟竞渡作为端午节活动中最主要的庆典仪式活动内容，在其不断的发展和流变过程中，必定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使其民俗庆典过程所体现的文化特征逐步高于一种农业文化和生活文化，也就是作为一种单一民俗文化事象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仪式化民俗事象的原因。

第二，能够丰富韩国传统拔河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传统拔河作

为韩国的一项民俗体育活动，深受韩国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影响。韩国自古作为传统农业国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民俗文化活动，形成了丰富的民俗思想，其中有言灵思想、巫覡思想、平明思想、山神思想（山岳崇拜思想）、百忍思想、灵魂不灭思想、生殖崇拜思想、敬大思想（祭天思想），崇祖思想（敬老思想）、重农思想（乐天思想）等，同时韩民族的生活文化分为天神文化（山神文化）、谷神文化、农乐文化。（김선풍，1997）韩国传统拔河是典型的韩国民俗活动，其传统民俗庆典仪式中，既包含了韩国的传统民俗思想，也涵盖了韩民族的生活文化。韩国传统拔河民俗能够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于它的“仪礼和游戏”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传统拔河民俗能够在现代社会能够继续举办的内在动力，也是韩国民众进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

第三，能够丰富中韩两国民俗体育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价值。传统龙舟竞渡作为中国古代先民原始信仰民俗和农耕生产民俗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民俗庆典仪式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韩国传统拔河民俗文化，特别是传统农业民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拔河”，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了韩国的本土文化特征和思想特征，并发展成为具有韩国传统农业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但在传统“拔河”民俗庆典和仪式过程中无不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和对其的影响。

因此，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民俗在各自的民俗庆典过程和各种仪式行为中，在两者的仪式表现形式和仪式行为的文化表达方面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就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受到“同一文化圈”影响的不同国度的传统文化事象的态度，以及进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出发点。

第四，能够丰富中韩两国民俗传统体育的文化学研究的应用价值。中国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拔河民俗庆典，两者在仪式过程中的大量仪式行为，充分体现了仪式的特征、形式、内涵和外延，并与两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信仰文化紧密相连。这两种仪式化的民俗体育同样也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特点，并都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但是发展至今，民俗文化日益受到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的全面影响，这种现代文化的影响具有趋同性特征，并具有很强的张力，这种影响是从文化事象的表层逐步深入内核，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影响是负面的。

因此，中国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拔河民俗庆典，特别是两者的庆典仪式过程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在不断萎缩、弱化和异化，并融入了更多的现代文化要素，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有利于这两种仪式化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发展？同时在现代体育大背景下，如何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体育文化大家庭中？值得深入研究。

二、研究的目标

第一，在“文化学”理论的指导下，明确作为人类文化的中国传统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传统拔河民俗，受到地域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决定和影响，这两项活动还可以归为“中华传统文化圈”，是东亚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产物。

第二，在“仪式”理论的指导下，明确中国传统龙舟竞渡民俗和韩国传统拔河民俗虽然属于两种不同形态的民俗体育文化，但是两者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都受到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影响，同时依附于这两种民俗体育文化而产生的庆典和仪式，具有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其“仪式行为”和“仪式过程”充分体现仪式的内涵、外延和结构化特征。

第三，在“文化人类学”理论指导下，明确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的民俗庆典和仪式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特征，并与两国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

第四，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导下，明确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拔河民俗庆典仪式，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仪式过程和行为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充分展现出各异的社会效能。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背景下，其仪式过程充分体现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品质和精神。

第五，在“民俗体育和竞技体育”理论指导下，在尊重民俗庆典和仪式的前提下，促进中国传统龙舟竞渡和韩国传统拔河与现代竞技体育相结合，使两者能够在创新发展的前提下共同融入世界现代体育文化宝库，促进各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中韩民俗的概念和分类

（一）民俗的概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①在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出现。如《礼记·缁衣》中的“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中的“楚民俗，好瘠车”；《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变民风，化民俗”，等等。

民俗文化中的岁时风俗作为人类集体的传承文化，其意义重大。因为岁时风俗作为传统文化模式是某个特定地区根基民众或庶民的潜能表现，也是民众集体意识的真实表现。而且它还是由季节习俗所形成的惯例。换句话说，岁时风俗是作为“日常生活中随着季节变化反复进行的习惯性民俗”^②，在每年的一定时期内习惯性、反复举行的生活行为，抑或是作为具有数百年或数千年价值的习惯性重复的传承礼仪被定义为“基于自然信仰与祖上崇拜，将宗教、咒术等复合行为和游戏相结合的季节性活动。”^③

部族国家的时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同时崇奉天、神、太阳、山岳等自然界的原始信仰（崇天敬神），民间信仰（萨满教信仰）是当时的唯一精神生活。也就是在五月下种十月秋收之后，群众聚集在一起对神进行祭祀的风俗。根据部族的不同这又被称为迎鼓、舞天、东盟、十月祭，这些大部分是性质相同的祭礼。

在传承下来的农乐中都可找到以这种祭礼为中心，昼夜饮酒、享受的歌舞的痕迹。包括这些农乐在内的这些游戏、娱乐等逐渐具有了竞争意识演化为某种竞技。因此，如今的竞技起源于游戏是毋庸置疑的。^④

韩国的民俗文化与岁时节日、农业生产以及娱乐、游戏、祭祀、礼仪等融为一体，是民众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精神信仰的体现。正如韩国的金善丰教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②（韩）任东权：《韩国岁时风俗研究》，集文堂 1985 年版。

③（韩）金努娟：《江陵端午祭的社会教育的研究》，中央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④（韩）罗绚成：《韩国体育史》，教学研究社 1981 年版。

授认为,韩国的民俗思想有言灵思想、巫覡思想、平明思想、山神思想(山岳崇拜思想)、百忍思想、灵魂不灭思想、性器官崇拜思想、敬大思想(祭天思想),崇祖思想(敬老思想)、重农思想(乐天思想)等。韩民族的生活文化分为天神文化(山神文化)、谷神文化、农乐文化。^①

(二) 民俗的分类

按照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俗具体分为信仰民俗、农业民俗、岁时民俗、节日民俗等几类。

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民俗信仰具有一定的崇拜对象。它世代传承,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灵魂、自然神、图腾、生育神、祖先神、行业神等。民间信仰不仅有特有的思想活动,还伴有行为方式,从事预知、祭祀、巫术等活动。^②

中国自古就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其中农业民俗是伴随中国古代农业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它是农民在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产物。它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生产的手段,具有明显的传承性。^③

岁时民俗,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节日。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节日民俗,指节日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不仅记载着我们祖先对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显示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民众那种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自然生活规律。^④

韩国民俗文化认为,岁时民俗作为从古代民间传承下来的多种游戏,是具有乡土特色,每年都举行的游戏。其产生动机主要如下。

第一,产生于驱逐夺走人性命的疫神、恶灵的活动。以前,人们认为病

① (韩) 김선용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1卷)》,国际亚细亚民俗协会,1997:67-69.

②~④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或灾难是恶灵在作怪，所以不得不用巫术来驱赶这些恶灵。于是，为了驱赶它们，许多人都参与进来，敲锣打鼓，假装用凶器来刺它们，威胁它们。并且，

进行一些类似驱傩的假装驱赶恶鬼的所谓感染咒术。举例来说，“狮子游戏”“埋鬼游戏”“踩地神”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二，产生于对延长人生命的谷物丰收的祈愿活动中。即在院子里摆上很多收获的谷物，以此来预祝丰年。举例来说，“祈求丰年”“架禾竿”等此类游戏就是在祈愿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三，产生于一定时期内，各地方动员战争的实例活动中。举例来说，“车战游戏”“强羌水越来”“韩将军游戏”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四，产生于军士及体力锻炼中。举例来说，“石战”“炬火战”“荡秋千”“跳跳板”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五，产生于祈愿无病长寿的活动中。举例来说，“乌龟游戏”“踏桥”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六，产生于慰劳农苦中。举例来说，“洗锄宴”“木牛戏”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七，产生于预测农作的丰年与凶年的活动中。举例来说，“尤茨游戏”“拔河游戏”等此类游戏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第八，产生于召回并慰藉死者灵魂的活动中。举例来说，“祭魂术”等就是在那种活动中所进行的。

从上述民俗游戏的发生动机来看，韩国的民俗游戏大部分根源于原始信仰，并与农业密切相关。这与韩国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国家有关，所以大部分游戏自然而然跟农业及民俗信仰密不可分。

岁时游戏既有普遍性的韩国全境内的民俗游戏，也有受地域限制的地方特有的民俗游戏。例如，“尤茨游戏”“放风筝”“跳跳板”是韩国各地都进行的游戏。但“车战游戏”“韩将军游戏”等民俗游戏就是仅限于安东或慈仁等事件发生地点的地方性游戏。

民俗游戏的意义在于它古老的根源。它跟我们祖先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的游戏跟民族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是健全的民众游戏。另外，这种民俗游戏给社会生活带来富裕，甚至对于促进国民的融合和生机有着重大的意义。^①

①（韩）崔常寿：《韩国民俗研究》，成文阁1984年版。

